

论作为中项的日常服饰

——从文化标出性理论出发

薛 晨

摘 要 服饰居于衣食住行之首,是人类维系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几乎人类所有的日常表意活动都离不开日常服饰的参与,但与时尚与时装相比,日常服饰的作用与意义却时常被忽视。文章聚焦于对日常服饰的探索,从文化标出性理论出发探讨服饰的日常性与非日常性问题,认为服饰的日常性来自于日常服饰作为文化中项从而具有中项性、无风格性特征。基于此,文章走进日常服饰符号系统之中,系统地对日常生活符号文本层面、符码规则层面以及操纵符码规则运行的符号权力层面展开层层剖析,探索作为文化中项的日常服饰符号系统的意义建构机制及其逻辑运行的总体规律。

关键词 日常服饰;中项;文化标出性;符码规则

中图分类号 J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8)11-0050-11

一、服饰中的“日常性”与“非日常性”

日常生活作为一个人们运用符号进行意义传达和交流的世界,这个世界所形成的日常生活文化在总体的社会文化范畴中具有独特特征。本文首先将从文化符号学的标出性理论来尝试为日常生活文化在文化范畴内做出准确定位和作进一步的特征分析。“标出性”(markedness)是赵毅衡对语

作者简介:薛晨,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日常生活文化的符号学研究”(项目编号:ZYGX2017KYQD189)研究成果。

言学术语“标记性”的新译,自从俄罗斯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Nikolai S. Trubetskoi)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讨论中提出清辅音和浊辅音在语言使用中的不对称性以来,语言的标出性引起了语言学范围内的广泛讨论。赵毅衡认为标出性在文化中普遍存在,原因不再形态上,而是符用上。对立二项的不对称,是一个普遍规律。而两相对立中,导致不平衡的是第三项,即中项。中项的特点是无法自我界定,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这种现象又叫做中项偏边。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为“正项”,正常的;中项排斥的就是异项,即标出项,是风格化的。^①中项偏边是所有文化标出性所共有的特征:语言的二元对立之间不一定有中项,而文化对立范畴之间必然有中项立文化范畴之间不对称性带来的标出性,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中项易边成为标出性演变的动力。因此,中项就成为各种文化标出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对立的观念中的一项争夺到携带中项的意义权力,就确立了正项地位,这是文化时时在进行的符号意义权力斗争。任何二元对立文化范畴,都落在正项/异项/中项三个范畴之间的动力性关系中。中项的站位决定意义,“为中项代言”则是权利行为的关键。结合标出性理论,本论文认为日常生活是作为文化中项存在。

日常服饰作为典型的日常文化形态从而具有日常性,也就是文化中项性特征。日常服饰作为文化中项,由于非正项且非异项,因此被认为是中性的、无风格特征的。日常服饰文化在社会文化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也不主动做出价值判断。日常服饰受到来自正项文化宰制权的影响下,对主流文化处于认同、跟随、甚至盲从的状态。因此,日常服饰文化处于一个社会文化生活中明显存在着两个不对称的、相互对立的文化范畴的中间,日常服饰文化与拥有文化宰制权的正项文化共同构成社会主流文化,从而共同排拒受到文化宰制权压迫和排挤的各种标出性文化,如亚文化、非主流文化等等。然而,中项作为区分正项与异项的边界,具有符号域中边界的多语性。这也就证明了文化标出性中的正项、中项与异项三者实则是对话关系。^②因此,在文化全域范畴下,日常服饰文化与正项服饰文化与异项服饰文化之间本身存在对话与互动,这解释了日常服饰文化站位与认同发生翻转时,正项服饰文化和异项服饰文化都将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文化发生整体性异动。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日常服饰,作为文化中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弹性的、持续的动态衍变中。

二、作为符号系统的日常服饰

在日常生活中,服饰的意义表达是依赖多种符号文本的组合,即以符号系统为单位来展开表意。当每一件衣服被人们在一定语境之下配合成一组套装,或一套搭配时,此时一件衣服就不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个日常服饰系统的一个组分。单个符号之间彼此邻接,每一件服饰都可以表达出远远超越一个单独符号所具有的意义势能。日常服饰的符号系统存在以下特征。

^①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9-284页。

^② 彭佳《对话主文本体:皮尔斯和洛特曼符号学视域中的文化标出性理论》,《符号与传媒》2015年第2期,第202-212页。

首先,日常服饰符号系统的全域小于整体服饰符号系统的全域,并与时装符号系统之全域存在交叉重叠且相互独立的部分。日常服饰符号系统,相对非日常的时装符号系统,以及总体服饰系统来看,这个系统中的符号结构相对简单,系统内部的组分数目低。与时装符号系统相比较,时装中常见的仪式性服饰并不存在于日常服饰符号系统中。如领结最初出现是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路易十四从他的雇佣兵那里学会了领结这种装扮,进入现代社会这样的领结逐渐演变为现在备受职场青睐的领带和常与礼服相伴的领结两种形式。领结随着时尚的潮流起起落落,它的外形也不断变幻新的模样。爵士时期的领结略见宽大,到1960年的“孔雀年代”,领结的风格倾向硕大撩人;到了80年代初期,它又回归了原本经久不衰的以黑色为主的色彩和短小精悍的身形。从领结的几百年历史发展中可以发现,领结自出现时就已经跳脱出日常生活范畴,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领结也始终是在时装符号系统中不断衍变,作为男性时装体系中重要的一个时尚符号而存在。除了领结,还有大量的时装符号是没有进入日常生活范畴的,质地昂贵的皮草大衣、女士赛马礼帽、男士燕尾礼服等等始终是属于非日常服饰中的时装系统。

其次,日常服饰符号系统与时装符号系统相同,都处于弹性的、持续的动态衍变之中。但与后者相比,日常服饰符号系统具有更持久的稳定性和低可变性。时装的时尚潮流变化速度迅速,以香奈儿为例,每年3月、10月举办两场成衣发布会,1月、7月举办两场高级定制服装发布会,从2002年起每年12月份举办一场高级手工坊发布会,此外还有一场每年5月份举办的早春度假系列服装发布会。时装品牌以速度来维持在时尚中的领先地位,时尚周期从过去的以年为单位,变更为以季度,甚至以月、日来计算。然而,日常服饰却总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日常服饰风格是一个反映一个时代文化总体风貌的一个窗口,20世纪7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苏童曾写道“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装,质地是白‘的确良’的……^①而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的女性“……她们多少化了些妆,服饰比较得体,花样最多。从裙到裤,从T恤到衬衫西装,没有不能穿的。还有无跟的凉鞋。常常有人在外面罩个精致的背心,式样也不雷”^②。从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女性的日常服饰总体呈现出一个较大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日常服饰体系的组份增加,在90年代除了依旧保留了70年代常见的纯色上衣、肥大裤子和裙装之外,还出现了时髦的马甲,T恤到女士衬衫、西装等新型符号文本。但总体而言,日常服饰符号系统本身是处于动态衍变进程之中,但是其衍变速度远远落后于时装符号系统。

第三,日常服饰符号系统的组合轴丰盛与聚合轴狭窄的双轴操作。任何符号文本,小至一个梦,大至整个文化,必然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即组合轴与聚合轴。这个观念首先是索绪尔提出来的,组合关系就是一些符号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雅柯布森认为聚合轴可称为“选择轴”,其功

① 吴亮、高云《日常中国:7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② 同上,第3-4页。

能是比较与选择;组合轴可称为“结合轴”,其功能是邻接粘合符号文本的双轴操作,在任何表意活动中必然出现。聚合轴的组成,是符号文本的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能被选择的各种元素。因此,聚合轴上每个可供选择的元素,是作为文本的隐藏部分存在的。因此,聚合轴,并不是接收者的猜测,而是文本组成的隐形方式。“聚合关系中的符号,选择某一个,就是排除了其他符号”^①,既然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构成就退入幕后,因此是隐藏的;而组合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显示的。

日常服饰展示在日常生活之中,可以发现其组合轴上是由上衣、下衣、裙装、外套、头饰、鞋履、配饰等搭配组合方式呈现出来,并且在日常服饰体系中,组合轴通常保持丰富完整。而组合轴上的每一个组分,如裙装,当人们思考具体选择什么样式、材料、花色、风格的裙装时则是裙装在这个环节上展开的几种可能的聚合段,文本组合中的每一个组分都有若干系列的“可替代物”。由此发现,日常服饰是聚合与组合的双轴交叉文本,它给文本接收者提供了“双轴显示”,这对接收者的影响在于,“双轴显示”文本是有意暴露选择过程的文本,接收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人们在日常穿衣时企图展现的当下的着装是在多样选择下产生的最优结果。

对比时装,由于日常服饰受到日常性的制约,所以日常服饰在其聚合轴上的限制了其聚合段的可选项目。“多选择”已经成为当代表意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象征。尽管现在早已不是生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但是日常生活中的穿衣选择始终还是受到了“日常性”的限制,因此在穿衣的聚合选择方面,始终窄幅。而时装文本的聚合轴异常宽泛。理论上,时装文本聚合轴应当呈现无限开放态势,这也就保证时装永远能够展现标出元素,风格始终多样化且出人意料。因此,对比日常服饰,作为标出文化的时装具有组合轴狭窄且聚合轴无限开放的双轴操作特征。

不论日常服饰还是时装文本,其聚合轴都具有弹性浮动特征,不论是更加开放还是收缩,作为中项的日常服饰与作为正项的时装二者都维持正相关浮动。唐朝时期文化灿然,这一时期日常服装与时装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均呈现宽幅浮动态势。在唐朝胡服蔚然成风,甚至完全加入到日常服饰的聚合选择之中。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中国衣冠,自北朝以来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靴……唐武德贞观中犹尔,至开元后稍博矣。”^②并且胡服当时已经进入女性日常服饰的选择之中,《车服志》说“开元中,子女衣胡服。”然而据王国维氏《胡服考》宋明时期明令禁止胡服和胡俗,复兴汉服。胡服几乎同时消失在日常服饰与时装之中。

三、日常服饰要求(dress code)与其符码规则特征

日常生活中如何穿衣,根据什么来穿衣,简单来讲就是人们常说的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的“穿衣

^① David Silverman, Brian Torode, *The Material World: Some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Its Limits*,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225.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 故事一。

要求”(dress codes) ,这也就是日常服饰的符码规则 ,这套符码规则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为自己的服饰文本编码 ,也引导着大家如何解释他人所展示的服饰文本。所谓符码(code) ,就是符号表意过程中 ,控制文本的移植入规则 ,控制解释的意义重建规则 ,都成为符码。^① 符码的集合被称为元语言。而元语言是理解任何符号文本必不可少的 ,日常服饰既然是一个关于服饰意义传播的问题 ,那就必然存在相应的元语言来提供解释的符码。那么 ,日常服饰符号系统中的参与文本解释所需要的元语言主要包括: 文本自携元语言、能力元语言及文化语境元语言 ,而后者是最为重要的解释规则。

首先 ,文本的自携元语言是符号文本本身参与构筑解释自身所需要的元语言。^② 文本固然是解释的对象 ,但是文本周边的伴随文本却对解释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 ,日常服饰表意显著地受到型文本主导与制约 ,型文本明确规定日常服饰的“日常性”风格。如设计简单、面料舒适、便于行动的简约风格正是日常服装的典型代表。其次 ,基本的副文本如服饰品牌、价格、设计师等会对服饰的表意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服饰品牌意义更多地是由其伴随文本在主导消费者的解释活动。而日常服饰大多指向设计师隐身的平价品牌。同时 ,在日常服饰系统中 ,对链文本的重视成为当下日常服饰表意的新趋势。日常服饰系统庞大 ,一种品牌服饰常常通过链接其他品牌文本来作为提升品牌意义势能的捷径。日常服饰界常见的“跨界”方式之一就是日常平价品牌与非日常轻奢品牌或奢侈品牌的跨界 ,如 HM 联手 Alexander Wang 推出的跨界服饰轻松创造了当年的消费神话。

其次 ,能力元语言来自解释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 ,包括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过去的解释经验的积累 ,过去对相关文本的记忆 ,个人的个性、爱好、信仰等等都会参与到构成能力元语言的构成当中。^③ 可以说日常服饰是一个人的能力元语言的集中体现。穴居人类“衣被苍生”、食肉寝皮; 而新石器后拥有穿线缝制技术后衣服作用不再停留于蔽体御寒 ,人们开始追求合身的形式美; 而打孔技术又丰富了人们的饰品选项 ,兽牙、兽耳、兽首等开始串起来成为象征战利品的饰品符号。日常女性服饰不仅体现出个人的能力元语言 ,更是其家族元语言的展现。以古代女性戴钗为例 ,钗制钗之料就有金、银、珠、玉、珊瑚、琥珀、水晶、玻璃等; 常见雕饰有凤凰、鸳鸯、燕、雀、鹦鹉、蝉、蝶、鱼等。选用何种材质可看出女子家境 ,选用何种雕饰也能明确反映个人性格特征。因此,“珠钗挂步摇”一句也能感受到戴钗女子的活泼个性,“侧垂高髻插金钿”可看出插钿女子的家族应较为宽裕 ,具有一定社会地位。

第三 ,文化的语境元语言是人们在展开日常穿衣活动是最为重要的解释规则。^④ 正如麦克拉克肯 (G. D. McCracken) 曾说 “穿衣就是社会现实的具体体现”^⑤。穿衣不仅将社会现实具体化的再现手段之一 ,也同时将穿衣这一行为本身转变为一种现实而存在。人类日常穿衣无法脱离社会语境 ,而日常服装在表意行为当中可以标示多重意义: 如审美趣味、生理特征、社会群体、时代语境、使用功

① 赵毅衡《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第219页。

② 同上 第22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G. D. McCracken ,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0.

能、亲密关系、流行本身或文化认同等。^①以日常服饰指示符号身份为例,中国古代服饰与身份密不可分,正如唐高祖武帝曾规定极其完备且烦杂的衣服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一等。

其中,性别身份是对日常服饰表意影响最为显著的社会语境元语言之一。性别身份的建构是社会文化意义层面的,而其表达形式却是符号化的,通过符号文本的展示,符号化的性别身份被建构和强化,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性别身份固化和性别多元化的冲突。

1. 日常服饰中存在性别强编码特征。日常服饰的最基础的符号功能之一就是性别认同。两性在日常服饰方面存在着强烈差异。中国古代男女有结发传统,而男女结笄却有大不同。贾公彦曾为《礼仪·士丧礼》中注疏“凡笄有二种:一是安发之笄,男子妇人具有,即此笄是也;一是为冠笄,皮弁笄,爵弁笄,唯男子有而妇人无。”^②不仅发髻样式有别,男女发髻长度、发饰等等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日常服饰最重要的符号功能之一就是加强对加强性别认同与固化性别身份。

由此可见日常服装中的性别符码实则是具有显著强编码特征。不论是符号发送者还是解释者,对日常男性服饰的解释几乎一致理解为要体现男性气质及凸显男子汉强壮、帅气的气概。而日常女性服装则要展现女性柔美气质。正如“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中来展现周公瑾的风流倜傥的男性气质,而事实上女子也由佩戴纶巾的传统,“黄金钗兮碧云发,白纶巾兮青女月”中尽管女子也佩戴白纶巾,但在此诗中所展现的女性服饰编码可以发现,金钗、碧云发、青女等符号与白纶巾一起被编码以期展现其楚楚佳人的柔美女性质质。

2. 日常两性服饰的符码特征。任何能够符码化的事物都依赖于某种人们共同的文化规约,显然,文化规约不是临时口头约定,它是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人们形成的对某些意义的共同的认同。当下日常生活中女性服饰与男性服饰的符码规则都发生了转型,这种转型具体表现为日常女性服饰的精密型符码与日常男性服饰的限制型符码。

1962年,伯恩斯坦发现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儿童的交际代码中存在社会阶级差异,分别使用限制型符码和详制型符码,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社会结构和权力的代表。^③劳动阶级所使用的限制型符码(restricted code),其组成多选择简单而受限的语言方式,其理解也必然依赖于特定社会脉络的语言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指性。使用限制型符码的劳动阶级,由于遵从共同的背景预设,每次交流都是对社会秩序和权力的强化;而中产阶级所使用的详制型符码(elaborated code)则不然,这种详制型符码本身就是由复杂的语言方式构成,并包含完整的语义,这类语言更重视个人思想的表达,其理解也并不一定要依附于某种特定的社会语境。由于中产阶级更乐意接受不同的背景预设,从而导致中产阶级的儿童会越过初级概括,直接进入次级概括,而劳动阶级的儿童则停留在初级概括。

① 宋颖《消费主义视野下的服饰商品符号》,《符号与传媒》2017年第1期,第29-39页。

② 贾公彦《礼仪·士丧礼》注疏。

③ 伯恩斯坦《阶级符码与控制:教育传递理论之建构》,王瑞贤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70-71页。

回到日常服饰符号系统中,男性服饰正是按照限制型符码进行意义的编码与解码的,男性服饰本身不论组合轴还是聚合轴都不如女性服饰体系丰富,可以说相当狭窄,因此,男性服饰系统中可选择的符号寥寥,组合方式更是单一,日常男性服饰受限于此,但恰恰是通过这样的服饰符码的操控才能达到男性企图巩固其主宰女性的符号身份和符号权力的目的。而女性则是遵循详制型符码进行日常服饰的表意与解释,女性日常服饰系统相对男性而言是非常复杂的,并且存在多种组合和聚合方式,其中就蕴藏着女性魅力的神奇秘密。即使是同一条裙装,通过多种搭配方法,可以达到展现多种迥异风格,如波西米亚风格、街头风格,甚至是运动风格。可以说,相对于男性,日常服饰成为了女性表意和自我认同的最主要的符号媒介。

3. 日常两性服装系统中不对称的开放性。尽管日常服饰内在演变缓慢,但伴随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性别符码实则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女性意识崛起,而女性选择不再被动臣服于男权的性别束缚,选择跳出生理性别而产生的羁绊,不再成为被男性凝视、被物化的对象,积极主动成为女性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和建构者,充分利用各种符号媒介表达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通过日常服饰来为女性自我发声。无性别(unisex)化女装出现较早,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从香奈儿推出第一条吸烟套装开始,服饰开始改写女性身份,固有社会性别结构开始消解,到吸烟鞋的出现、Tomboy风格的出现,社会性别结构逐渐被重构,结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

伯恩斯坦进一步提出,凡是遵循详制型符码的群体也可以采用限制型符码,反之,遵循限制型符码的群体却不能采用详制型符码。同理,女性可以采用男性穿衣规则中的一些元素,例如职业女性所穿戴的西服和领带正是从男性服饰体系中的西服套装和领带变形而来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无性别女装等一系列稀释性别特征的服饰符号开始加入到了日常女装体系之中。但是男性却不能和女性一样平等地使用女性服饰符码,正如穿裙装的男人总则遭到社会谴责。男性日常服饰似乎较之女性,其符号形式更加固守成规。这也解释了为何男装无性别倾向出现大大晚于女装。男装无性别倾向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女性化的服饰元素开始加入男装的设计之中。例如,无性别的男装不仅卸掉了传统西服厚实的垫肩,同时女性的无袖、卷袖和不对称袖子也出现在男装在肩部裁剪上,轻薄圆滑的肩部设计,往日阳刚的男性高大方正的肩部造型不复存在,让宽肩膀的男人也显出别样的味道。而较之女性的日常服饰的“反叛”,日常男装的“反叛”之路却困难重重。尽管在高级时尚领域,男装的无性别化已经非常显著,但是回归日常生活视阈下,日常男装的无性别化进展的实则极其缓慢。

由此可见,尽管都作为文化中项,日常两性服装依据不同的符码规则从而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日常女装依据详制型符码建构一个结构相对松散的文化中项,从而打开了日常女装变化与变异的可能性。而日常男装采用的限制型符码将其建构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中项结构,从而导致日常男装与正项文化、异项文化间的意义流动受阻缓慢。

四、日常服饰中的符号规则与权力分配

上文讨论了作为符号系统的日常服饰的日常性与符号特征,那么日常服饰的意义传播又遵守什么样的规则?范·鲁文(van Leeuwen)在《社会符号学导论》中认为符号系统被人所创造、由人而改变,为了解决符号系统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首先针对所有的符号资源提出一份符号规则清单,具体规则可以根据以下五个基本问题展开。

1. 控制是如何运行的,被谁所控制?
2. 怎样才能达到公平?每当规则出现,则应该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或者,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此公平才能伴随规则,其他规则也会以其他方式达到公平。
3. 规则有多严格?它们允许多大程度上的个性化和差异产生?
4. 如果人们不遵守规则会怎么办?对这样异常举动会有什么惩罚?
5. 规则可以改变吗?如果可以,如何改变?处于什么原因才能改变?^①

并且,鲁文根据每一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相对应的符号规则以此作为问题的解决原则,这五条符号规则分别是:个人权威原则(回应问题1)、非个人权威原则(回应问题2)、一致性原则(回应问题3)、榜样示范原则(回应问题4)和专业原则(回应问题5)。鲁文提出的五条原则主要是解决符号系统中的符号权力分配问题。日常服饰符号系统同样面对符号权力分配的问题,并深刻影响日常服饰规则的建构,因此,本文将从以上五方面对日常服饰符号系统中的符号规则与权力分配进行梳理。

1. 日常服饰是由谁来控制的,这种控制机制又是如何运行的?根据鲁文回应第一个问题所提出的规则来看,日常服饰系统中,是存在个人权威对日常服饰表意进行操控的,并且在此体系中无人会轻易质疑他的权威地位,这也就导致了时尚在他人看来颇为无理。事实上,个人权威,可以指向一个具体的人,如生活中具有政治权威、社会权威、职业权威等人。孔子在《论语》中曾说“君子不以绀? 饰品,红紫不以为褻服。”由此,“满朝朱紫贵”,红紫色几乎成为象征封建社会统治阶层富贵皇权的色彩。而对红色的喜爱,也从王公贵族发展到日常百姓之中。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Facebook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二人作为IT行业的领军人物都热衷于运动休闲风格,以简单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为主。这两位行业权威的穿着成功影响到了整个IT行业的穿衣风格。

当然个人权威并不仅限于一个具体的人,也可以是一个虚拟人物,一个权威的机构等。礼制对中国传统服饰的影响深远,从两周时代开始,礼制对服饰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受殷礼影响,周礼对服

^① Van Leeuwen,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Routledge, 2004, pp. 53 - 58.

制从服色、质料、等级等方面都有规定。而各个朝代都有礼部礼官对服装制定严格的规定。平民服装尽管没有贵族等级分明,礼节繁缛,但在首服、衣服、裤裳、足衣等方面都要受到当时社会礼制的约束。而现代日常服装的权威也掌握在少数时尚机构手中。以色彩为例,色彩作为日常服饰符号系统中重要的一个元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设计、材质更为重要。那么什么颜色时尚,什么过时,又是由谁来掌控这种符号权力呢?在2017年Pantone^①提出的年度色彩为水晶粉(Rose Quartz)和静谧蓝(Serenity)。反观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这两个年度色彩的反映,从UNIQLO、ZARA、HM等一众快消品牌推出的2017春夏款竟然都以这种清新明快的颜色作为色彩主题可见一斑。

2. 日常服饰如何才算穿对了?事实上,美与丑很难有一条绝对准则,日常生活更多讲求是否穿对了场合。因此,哪些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证明谁的穿着才是正确?关于此,鲁凡提出的非个人权威原则中的书面权威与传统权威可以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解决办法。书面权威,巴尔特曾经对其有过详细的论述,在《流行体系》中他重点从时尚杂志的语言结构中来讨论“书写时装”如何成为流行,又如何建构流行体系。^②书写这种符号形式,其符号发送者通常为专业权威机构,书写从而天然带有社会权威意义。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书写权威并不是指时装杂志中提供的穿衣指南,而是指向一系列日常生活当中的书写符码,例如用人单位在用人协议中所写明的工作穿衣规则,或者在工作场所张贴的员工守则中提及的日常工作穿衣指南等。法律文本也成为指导日常生活穿衣的一条重要的书写权威规则。例如《劳动法》第54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包括安全帽类、防护服、防护手套等等。

另外传统权威,在日常生活中,传统时常让位于个人权威或者专业原则,但是不论从整体社会发展来看,传统权威仍然具掌握有强大的符号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活动中的日常服饰都受到一系列历史悠久、形式复杂的传统权威约束。婚礼穿红,葬礼用黑是最基本的一条传统权威。同时,尽管存在地域婚俗差异,但对于参加婚礼的宾客着装要求大致都包括禁止穿着白色裙装,禁穿全黑礼服,禁裸露等基本要求。

3. 日常服饰规则有多严格?它允许多大程度上的个性化和差异产生?时尚的一大特征在于它不需要遵循既定规则,它必须需要脱离既定规则,时刻与日常保持距离,从而实现不断地标出于日常服饰。但是日常服饰系统则恰好相反,要求自身在一段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对于处于稳定变化中的日常服饰规则来说,我们应当如何测量它的严格程度呢。事实上,人们在符号交流与互动形成社群,探究社群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真相,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社群成员之间在符号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就必然共享某些认同感;这也即皮尔斯所谓的社群三种情感:承认社群中具有超越个人利用的最高利益;并且个人愿意把此利用看作与个人利益紧密相关;最后,存在着相信通过科学探究

^① Pantone 作为一家以专门开发和研究色彩而闻名全球的权威机构和供应商,它的配色系统已经延伸到色彩占有重要地位的各行各业中,每年它都会指定一种色彩成为年度色彩,这样的年度色彩是一种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共鸣的颜色。

^② 廖茹茵《结构与互动:时尚符号学研究的两条路径》,《符号与传媒》2017年第2期,第138-150页。

必然会获得最终确定意见的那种希望。那么将研究视野回归日常传播活动之中,可以发现,日常服饰的符码规则的建立始终是依靠其探究社群,即解释社群。处于同一个日常服饰解释社群之中的成员,他们共享对于某种服饰风格的认同感。《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汴梁城中卖香人带帽子,披背子。当铺管事儿人穿长衫,束牛角皮带不戴帽。秀才儒生则穿黑背子,外罩紫道袍,头戴乌纱巾,足蹬黑皮鞋。巡兵则要穿黑色衲袄,腿缠粗布行滕。^①结构松散的社群内部日常服饰规则较为宽松,相反在组织结构紧密的社群中,日常服饰规则及其严格,是其社会身份的最重要的指示符号。花翎在清朝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其作用是昭明等级、赏赐军功,清代各帝都三令五申,既不能簪越本分妄戴,又不能随意不戴,如有违反则严行参处。一般降职或革职留任的官员,仍可按其本任品级穿朝服,而被罚拔去花翎则是非同一般的严重处罚。总体来看,在一个阐释社群内部,日常服饰规则是相对比较严格的,而处于社群内外的个体则感受不到这种服饰规则的约束力和效力。

4. 如果人们不遵守这种日常服饰规则会怎么办?对这样异常举动会有什么惩罚吗?所谓打破日常服饰规则,也就是出现日常服饰符号系统与非日常符号系统中的构成组份跨界,从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都是中古代常见的天子服的图纹和王权象征符,即典型的非日常服饰构件,这些图纹的使用历朝历代都有严格规定,一旦向日常跨界符号使用者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同样,清朝的发辫规则,清人入关颁布剃发令,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武昌起义中剪辫俨然成为是否支持革命的关键符号活动。发辫在日常与非日常的之间来回跨界,因而面对日常发饰规则的突变,百姓在变革面前的茫然无措也导致其难免违规后的处罚。而鲁凡认为榜样示范原则是维系基本日常服饰规则的一个解决办法。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标杆人物黎元洪的剪辫事件带动了大批人主动减掉辫子。日常服饰榜样,简单来说就是日常生活中受到公开表扬、认可的人。社会控制的操控一般会将处于某一解释社群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推选为社群榜样,从而向社群中的其他成员展示绝对遵循社群规则的人将拥有绝对的符号权力和社群地位。在符号意义的传播过程中,这样一位权威的个人在日常服饰表意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是意见领袖一职。意见领袖作为符号意义在传播和扩散的重要节点,随着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扩大,甚至在达到某种程度后,可以直接接管解释者的解释能力,主导意义的流动方向和解释方向。而当社群成员与日常服饰示范榜样相左时,则存在被社群成员孤立、被标出,从而最终出现被动脱离该社群的风险,清初不蓄辫者以杀头论处,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发布《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军政府要求军、警、政三界人士必须剪辫子,否则轻者没收证章,扣发月饷,重者开除公职。

5. 日常服饰规则可以改变吗?如果可以,如何改变?处于什么原因才能改变?日常服饰规则改变,从其符号系统内部机制来看,是日常服饰文化作为服饰文化中项受到正项与异项的不同认同压力从而发生中项认同问题。正项文化通过操纵手中文化领导权,对中项文化中最核心的意识形态

^① 古月《中国民俗文化:服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56-59页。

层面上施加向正项文化认同和靠拢的压力,进一步将这种操控压力和认同压力通过文化中项的层级向外层层扩散,从而达到日常生活文化最终站位在正项文化一方。因此,一旦文化出现标出项翻转的现象时,也就意味着,正项的文化领导权失去了对中项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控制和操纵权,从而使得正项丧失中项对其的认同,转而对认同异项,从而造成标出性翻转的局面。

日常服饰规则改变,也就是日常服饰文化不再认同正项文化,从而造成正项对日常生活的文化领导权失效。从文化全域来看,当正项丧失其操纵的文化领导权时,正项对日常服饰所施加的强制性认同压力则会消失,从而导致日常服饰作为中项的重新选边。伴随朝代更迭,历朝服制也不断衍变。最显著的就是日常服饰会在历史更迭中伴随正项文化的改变发生变化。自春秋战国社会动荡,在这一时期日常服饰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上衣下裳合制为一件衣服,即深衣,汉朝也延承其传统,汉朝女性所穿服装多为深衣,但在衣襟、裙摆等设计与之前发生较大改变。深衣作为华夏民族流传最为悠久的传统服饰之一,对汉服概念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代儒学家对各朝深衣形制改变也大有研究,如对宋代司马光的“温公深衣”,朱熹的“朱子深衣”,明代黄宗羲的“黄梨洲深衣”等深衣描述中可以发现深衣作为传统服饰的历史变化。

而违反日常服饰规则,则会导致自身标出于中项,带来被孤立的焦虑感和恐惧感。然而在文化包容度更加宽松的社会之中,正项文化对异项的包容度相对较高,关于异项的“意见环境”更加包容理性,对日常服饰的强制认同压力也大大减弱,从而给予了日常服饰一种较为宽松的认同环境,从而给予异项提供一种缓慢翻转的可能性。在中国历史中的胡服作为一种典型亚文化,它曾经长期受到来自社会主流文化的压制和抗拒,然而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推进,社会包容度逐渐增加,胡服入汉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尽管宋朝禁止穿戴胡服胡饰,但是胡服形制,如对襟等设计已经深入汉服设计之中。

五、结语

日常服饰作为文化中项,从而具有中项性、无风格性特征,因而在人类日常文化的各种意义活动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时常受到忽视。日常服饰的中项性,从符号文本层面,日常服饰的中项性体现在日常服饰符号系统的组合轴丰盛与聚合轴狭窄的双轴操作之中;而在符码层面,日常服饰由于其强编码特征从而呈现中项性与动态性,特别是在日常两性服饰方面尤为显著;而在符码规则背后,日常服饰受到多方符号权力操控,从而在不断维持中项稳定的同时,保证弹性且持续的衍变与进化。因此,本文以日常服饰为研究对象,实则讨论了一个动态的、弹性的文化中项符号系统的意义建构和运动规律问题。

责任编辑:王望